

· 修辞学大视野 ·

本期话题：修辞学科学术观察与思考（二）

特约主持人：谭学纯教授

主持人语：修辞学的交叉学科性质和修辞学研究的跨学科视野，决定了多学科构建的学科大生态和多学科共享的学术空间，也决定了修辞学科学术观察与思考的多重场域和理论背景。

《保罗·德曼：重建逻辑、语法和修辞的关系》针对教科书知识谱系中语法、修辞和逻辑各自被规定的权力，探讨世界如何在审美化的修辞活动中重建话语秩序。

《中国小说“言语”修辞模式简论》从“大文学”和广义修辞学的角度，联系小说讲说方式及特定场景、情境、接受主体、话本刊行等多重因素讨论问题，力图还原“说话”作场空间，考察小说“言语”修辞模式。

《传统及当代汉语“用典”规范的新修辞观》针对国内用典研究“各唱各调，互不相关”的格局，融合西方“新修辞”理论资源，考察文本与受众主体和作者创作动机之间的互动。融入学科大生态的修辞学研究，需要理论证明，更需要实践探索。

保罗·德曼：重建逻辑、语法和修辞的关系

谭善明

(聊城大学文学院, 山东 聊城 252059)

摘 要：西方传统的人文教育三学科之间的秩序在形而上学的框架内被“理性”的安排，修辞成为逻辑和语法的附庸。德曼从“修辞认识论”的角度重建了逻辑、语法和修辞之间的关系，从而向我们揭示出世界秩序是在审美式的修辞活动中完成的，它表面上呈现为不容置疑的真理，暗中却被自己的转义结构所破坏。

关键词：修辞；语法；逻辑；修辞认识论

中图分类号：H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85(2014)01-0053-05

修辞学是包括保罗·德曼在内的耶鲁学派学者们构建文学理论的重要基础。但在对文学文本展开修辞批评之前，首先要对传统修辞观念进行清理，以使修辞从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德曼从“修辞认识论”的角度重建逻辑、语法和修辞之间的关系，其用意正在于此。

一、对逻辑、语法和修辞三者传统关系的质疑

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盛行以后，修辞学起初被当作异教文化而摒弃。后来由于解释圣经的需

要，修辞学渐为教会所重视，并得以与“语法”、“逻辑”并列成为人文教育的三学科。于是，修辞学也因此成了脱离任何意见、观念的纯粹技巧。但丁曾说过“诗不是别的，只是按照音乐的道理去安排的章词虚构”，诗人在用“修辞格的外表或章词色彩”来写诗时，头脑里应有一个“推理”：如果诗人“被追问出，他不知道揭去言词的外表以使这些言词具有真诚的意图

收稿日期：2013-09-17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审美视野中的转义修辞研究》(13BZW007)、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论转义——话语修辞的一种审美研究》(项目编号：20100481292)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谭善明(1979—)，男，安徽来安人，博士，聊城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西方文论与修辞美学。

时”，那他可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① 修辞只是“意图”的“外表”，只是被附加上去的装饰，在必要的时候是可以被去除的。但是语法和逻辑可以在表达中被去除吗？在三个学科中，语法和逻辑与修辞的地位显然并不等同，人们不会怀疑前二者在说话行文中的必要性，却经常会警惕修辞对意图的篡夺，而语法和逻辑是有规律可循的，它们起积极的保障作用。修辞虽然有一定的技巧，但正如西塞罗所指出的，先天的禀赋必不可少，它的使用是一门技艺，是需要创造性才能的，所以修辞是不可能轻易驾驭的，它在话语中所产生的转义也是难以预测的。哈特曼就指出：“在更单纯的语言中，诱惑被称为说服；修辞学或者对人加以说服的艺术经常被论辩的艺术，比如逻辑学和辩证法所批判，对于寻求一种对事物真义有力的顿悟，或者对于完全弄清的解释这样一种要求来说，逻辑学和辩证法主张一种更高的真理。”^② 在这三门有关语言的学科中，逻辑和语法关系最为密切，它们被认为在探究真理和建构认知世界稳定的秩序方面提供了保障作用，由于修辞在说服功能上的诱惑力，名声一直不好，它的地位只能屈居逻辑和语法之下。

这样，人文教育三学科之间的秩序在形而上学的框架内得以“理性”的安排：语法服务于逻辑，逻辑开拓对世界的认识，而修辞则是二者的附属品。即使是在文学领域，修辞在话语运作方面的能力也要受到逻辑和语法的制约。这样的情况在当代文论特别是结构主义理论中依然明显。结构主义认为文本由一种抽象的逻辑或语法结构所统御，这种结构是话语修辞得以顺利展开的基础。结构主义叙事学虽然为修辞保留了运作的空间，但只是存在于话语对故事的分解、重组、扩充等叙述行为中。这样，修辞活动在逻辑和语法的限制下举步维艰。就像布雷蒙在谈到叙事逻辑时所指出的“叙事作品的符号学研究可以分成两大方面：一方面是关于叙述技巧的分析；另一方面是关于对所叙故事起支配作用的那些规律的研究。”^③ 这样的规律就涵盖了对话语修辞活动的约束。还有巴特的叙事学研究也是将叙事语法的研究包括在逻辑方法中，他从逻辑方

法出发，在《叙事作品分析导论》中他展示了全面的叙事作品的结构分析方法。在这种情况下，修辞完全被看作是逻辑和语法结构性生成的产物。

德曼将自己的理论研究聚焦于文本的修辞结构及修辞性阅读，他对语言领域内逻辑、语法和修辞这三者的关系进行了重新定位，从根本上为修辞的解放破除障碍。在《符号学与修辞》一文中，德曼批判了这种情况：结构主义将语法结构同修辞学结构相混同，从而将辞格研究“变成了语法模式的单纯延伸，变成了句法关系上的一种特殊亚类”。^④ 在托多洛夫和热奈特的修辞模式研究中，修辞被语法所吸收或者被还原成语法。但是，修辞是如何被包含于语法之内的，结构主义并没有给出合理的解释，或者说这并不是他们所重视的问题。而德曼现在的工作则正是要区分语法认识论和修辞认识论，这是一项“令人生畏的任务”，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于认同语法系统的普遍性和生成性，它可以从一个单一模式中派生出无限的子模式，这种形而上学的观念妨碍修辞从语法中获得独立。但人们也注意到，修辞的力量似乎总是要与语法作对，它始终在语言中制造偏离，始终要拉开与语法的距离，如果将焦点从语法一极移向修辞一极，马上就会呈现出另外一种秩序。这样一种观念转换只有在超越了形而上学的框架才会真正实现。德曼提到伯克、皮尔斯、尼采和索绪尔，他们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强调语法和修辞之间的差异。伯克指出语言的修辞学基础乃是“偏转”，它“是对在语法模式中运作的符号和意义之间的前后一贯的联系的辩证颠覆”，而皮尔斯则坚持认为“符号并非事物本身，而是凭借一种再现过程从事物那里派生出意义来，这一过程并不只是生成性的，换言之，它并不依赖于某个单一的意义源泉”。^⑤ 皮尔斯的符号学理论将释义过程看作是一个符号产生另一个符号的过程，这是一种纯粹修辞学的过程，它无限地进行着符号层面的生成运动，和纯粹的语法相区别，因为语法假定二元性含义的存在；这种修辞学过程又执着于符号层面的偏离运动，完全不同于逻辑运作，后者将普遍真实性作为一种预设。

① 克罗齐 《作为表现科学和一般语言学的美学的历史》，王天清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21页。

② 哈特曼 《荒野中的批评》，张德兴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5页。

③ 布雷蒙 《叙述可能之逻辑》，张寅德译//《叙述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153页。

④⑤ Paul de Man, *Allegories of Reading*,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6、p8-9.

二、自我解构：逻辑和语法的修辞性

相对于语法而言，逻辑在语言中的地位更为基础，如果能够揭示其合理性背后的人为建构性，或者指出逻辑的形成与修辞的相关性，那么逻辑与修辞的关系以至语法与修辞的关系都要重新被认识。

这样一种解构工作在德曼之前其实已经开展了。在《说服的修辞学（尼采）》一文中，德曼介绍了尼采是如何颠覆逻辑之真理的，以及如何进一步揭露逻辑的修辞性的。关于逻辑问题，尼采在《权力意志》文稿中多次提及，他是将逻辑视为形而上学思想的一个坚实基础而加以批判的。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矛盾律是最可靠的观点，即“肯定和否定同一事物，这不会使我们获得成功”，它被认为是“最后的、最基本的、构成一切引证的根源的定理”。^① 尼采认为这里存在两种可能，第一种是矛盾律是对实体作出的断言，它是在断定（*erkennen*）事实；或者它只是一种命令，是在假定（*setzen*）事实。在逻辑的实际运用过程中，人们其实并不必然要先认识实体，因而这样的命题不包含真实的标准，只应当被看作是真实的命令。逻辑学是在仿制世界的真实，即把实体、属性、客体、主体、行动等一切基础都假定为现实性，以此设定了一个形而上学的世界，即一个“真实的世界”。对此，德曼从言语行为理论对语言的描述行为（*constative*）和施为行为（*performative*）的区分出发，将逻辑的“断定”视为前者，而将“假定”视为后者。“断定”只是表达实体及其属性的统一性，不改变事物的秩序，依靠“自我同一的A”来阐明自我同一性。德曼指出“断定假设已知实体的在先存在的及物功能，并且通过性质推断认识的能力。它并非通过实体自身来推断这些属性，而是通过实体被允许成为的样子来进行推断。”^② 因而是“命名的和表述的”。但是在尼采的批判中，实体本身是不可能被认识的，因而我们无法“断定”一种统一性，这里面其实发生的是一个修辞的过程，即“同一性原则的令人信服的力量应归因于事物的感觉对实体的认识的类推、隐喻的替代”，“同一性”原则只不过是一个强制的言语行为，即 *performative*，这样逻辑

那貌似符合本质和真理的“断定”就被揭示为以偶然性替代必然性的“假定”。

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还能够断言逻辑像数学一样是一种纯粹求真的知识体系吗？逻辑优于修辞又从何谈起呢？既然我们对实体的本质没有先验的认识，而是凭借感觉通达事物，就无法确知“真”与“不真”，矛盾律这样的逻辑判断也只能建立在修辞的结构之上，即以形式化的秩序替代实体的本质，这正是换喻修辞。所以，德曼进一步指出“同一性的和逻辑的语言以命令的方式确立自己，这样就认识到它在设定实体方面的能动性。”^③ 逻辑进行“假定”的言语行为乃是施为行为，但它在作出命令的同时又将自己预设为描述行为，即逻辑假设自己以同一性的身份在陈述本质和真理，现在看来这种“假设”便是谬误，逻辑和数学的真实不是对本质的认识，都只不过是一种假设行为。尼采和德曼的解构工作正是要揭露逻辑的描述行为以及形而上学体系中所有的描述行为都只不过是施为行为，都是以修辞式的谬误建构起来的“真理”认识。

德曼的立场非常清楚：只要摆脱形而上学的框架，消解语言的求真意志，修辞就不会再是逻辑和语法的附属品，修辞乃是文本意义生成的源泉。在很多地方，德曼都强调了修辞对语法的超越性。当文学理论不去触动语法的基础地位时，当我们的思考仍局限于二元性的知识体系时，文学就会保持其统一性，但是从尼采以来，形而上学的神话渐已破灭，人们渐渐对语法结构的坚固性产生了怀疑，正如德曼所言“只有当再也不可能忽视话语修辞维度上的认识论压力时，也即再也不可能使它就范于仅仅是附属品，仅仅是语义功能内的装饰品的地位时，才会出现困难。”^④ 语法再也不能让修辞就范，语法和修辞之间的关系须重新划定。当然在历史上，这二者的关系一直是暧昧不清的，比如转义过去既是语法的一部分，也是修辞的一部分，从语法的角度说，它是语法生成性的表现。如果从传统的语法认识论来说，转义是对“中心”的偏离，而要是从修辞认识论的角度来看，转义无限的“差异”运动，它不会回返中心，只会从差异走向差异。逻辑和语法研究是对文本的

① 尼采《权力意志》，张念东、凌素心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255页。

②③ Paul de Man, *Allegories of Reading*,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121、p. 124、p. 270.

④ 德曼《解构之图》，李自修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07、112页。

静态考察,这样的研究自有其合理性,但是文学研究如果过于重视这一方面,就容易忽视文学意义的差异性和生成性,而修辞研究则强调意义的动态生成,这不仅是强调文本意义的自我运动,更是强调要在阅读活动中完成文学的意义增殖。语法对修辞的围困,用语法代码转换修辞转义;而修辞对语法的超越,则是通过阅读活动消除语法认知,这一点非常明确“因为读者一旦意识到文本的修辞维度,他就肯定会找到那些不能简约为语法或由历史决定的意义方面,只要他愿意承认自己势必要注意到这些东西。”^①这也是“阅读的寓言”对形而上学的批判,使修辞突破语法中心论而归语言的生成性上。

事实上,我们无法回避文本的语法和逻辑,但是文本的指称意义并不能简单地被看成是由语法或逻辑所派生出来的。不可否认语法是和指称意义相对应的,但二者之间有着难以化解的矛盾,其背离就是语言的比喻方面,亦即修辞性的转义使指称在差异运动中无限偏离。因而,德曼指出“我们称文本为任意一个可以从下述双重观点考察的实体:作为一个生成的、不尽的、非指称的语法系统和一个先天性颠覆了文本语法规则的、闭合的比喻系统。”^②这里涉及文本存在问题的重新定位,即从真理式静态的语法层面转向不断生成的修辞层面。以下这一点不能忽视:没有语法就没有文本,同样没有修辞也没有文本,德曼强调修辞对语法的超越并不是要否定语法,而是要对二者的关系进行重新审视。

三、如何确保语法和修辞之间的“张力”和“含混”不被统一性所消解

由于德曼一方面强调修辞对语法的超越,另一方面他又不否认文本中语法的存在,并没有从语法中心论转向修辞中心论,那么一种解构性的力量是如何将语言形而上学的秩序颠覆的,并使修辞能与语法平起平坐的?解构主义并不是要从一种二元性走向另一种二元性,而是要根本上取消二元对立,修辞和语法的关系上也是如此。所以德曼提出了“语法修辞化”和“修辞语法化”两种不确定的表意模式,以强调语法和修辞在文本中的相互交涉导致了意义的含混、矛盾和冲

突。语法和修辞的对立是人为的设定,其目的不过是为了保障语言和文本的稳定性,也正是这种设定使语法本身也被片面地理解。其实,语法和修辞都包含两个相同的因素:转义和劝说,二者并不是根本对立的。

先看修辞中的情况。米勒指出“自从古希腊开始,修辞一直是一种有两个分支的学科。一方面,它是说服能力的研究,即如何使用词语;另一方面,它是语言之运作的研究。它尤其是转义功能的研究,包括林林总总的修辞手段,不仅仅是隐喻,还有换喻、提喻、反讽、进一步转喻、拟人、夸张,引申,甚至是整个作品。”^③这两个方面在历史上被区别对待,造成了修辞学地位及其尊严的矛盾状况“一方面,比如在柏拉图那里以及在哲学史上的每个关键时刻(尼采便是其中的一个),修辞学成为思想观念中能够想象到的最深远的辩证思考的基础;另一方面,正如在从昆提里安到当代的几乎一成不变的教科书中所呈现的那样,修辞学是演说中欺骗性语法的卑微而不十分受尊重的侍女。”^④这就表明,修辞的两个方面,转义和劝说始终是被割裂开来的,劝说乃是辩证法或话语的基础,而转义则暗中破坏了这一基础,语法正是通过对修辞有目的分离而实现其自我同一性。德曼在《符号学与修辞》中谈到,转义被语法收编发生在结构主义那里,当代语法结构研究将转义和修辞格研究转变为句法研究,修辞模式就成了语法模式的附属,而劝说被归入语法则出现在言语行为理论之中,“那些被称为示言外之意的命令、疑问、否认和假设等行为的完成,在语言中和祈使句、疑问句、否定句和祈愿句相对应,同句法结构相一致……既然强调修辞学的劝说是作用于他人的实际行动(而不是语言内部的修辞格或转义),那么就很容易见出语法示言外之意的领域和修辞学收言后之果的领域之间的连续性。”^⑤显然,结构主义将以语法吸收修辞,原因是他们只将修辞的转义功能这一半纳入到语法中;而言语行为理论用将修辞的另一半即劝说功能吸引到语法中。^⑥

① 德曼《解构之图》,李自修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07、112页。

②④⑤ Paul de Man, *Allegories of Reading*,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270, p. 130, p. 8.

③ 米勒《重申解构主义》,郭英剑等译,北京:中国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82页。

⑥ 这一问题已有论者作过研究,见申屠云峰《保罗·德曼的“语法”和“修辞”》,《外国文学》2006年第4期。

转义和劝说这两个分离的层面导致了修辞的不幸，然而，寻求统一性和中心性的语法也和修辞一样包含转义和劝说。从德曼引述尼采的相关文字中，我们已经看到逻辑和语法将自己作为普遍性的认识推广开去，也就是作为描述性语言而出现，但尼采已然揭示出它们不过是“假定”性的命令，而不是对世界的本质认识，因而它们不过是施为性语言。这也就是说，语法所谓的普遍性只不过是一种命令或劝说，而语法的生成性则相应地就是转义。当语法的普遍性被揭示为一种建构性以后，语法的生成性或转义也就失去了对中心的依赖。于是，德曼得出结论，施为性语言和描述性语言的差别只不过是转义和劝说的翻版，修辞被视为劝说时即是施为性的，而被看作转义时则解构了自己的行动（因为转义就是偏离、差异的制造），^①相应地，在语法中的情况则是：作为描述性语言的普遍语法以其真理性要发挥劝说功能，却遭到语法的施为性的限制，也就是说语法的转义层面或生成性正好构成了对普遍性的威胁和破坏。如此一来，语法在形而上学体系中就丧失了优势地位，它和修辞一样包含着自我解构的成分，也就没有理由再收编修辞了。

在德曼这种“修辞认识论”视野中，我们

可以看到：语法不再被视为世界理性秩序的语言对应物，它被看成是以审美式的修辞活动完成的对世界秩序的重建，它以“真”的形式被建构起来，暗中却被自己的转义结构所破坏，隐喻、换喻、提喻和反讽等修辞格是语法得以被实施时无法分离的伙伴。语法（包括逻辑）的普遍性和统一性和真理的生成一样都是以审美的方式开始，经过强有力的论证最终得以在观念世界中长存。修辞认识论揭示了这种审美与意识形态的变奏过程，向我们展示了全新的世界秩序，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这种修辞学雄辩乃是自我解构的，它也不过是转义生成中的一环，否则自身将沦为意识形态之物。只有这样，才能不误解德曼对语法和逻辑的解构工作：当劝说和转义两个方面被分离以后，我们就会冒着意识形态的风险将文本与现实等同，不仅是修辞学的转义过程解构了劝说过程，语法中发生着同样的事情，只有将这两个环节并置，自我解构或文本的开放性才不会停止。修辞解构语法是建立在修辞确认自我解构的基础之上的，如此一来，修辞认识论并不想也无法证明修辞高于语法，而是要保证语法和修辞之间的“张力”和“含混”不被统一性所消解，即保证文本的不确定性和多元性。

（责任编辑：陈芳）

Paul de Man: Reconstruction Relationship of Logic, Grammar and Rhetoric

TAN Shan-mi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Liaocheng University, Liaocheng 252059, China)

Abstract: The order between three disciplines of humanistic education in western tradition is rationally arranged, that rhetoric being appendage of logic and grammar. De Man rebuilds the relationship of logic and grammar and rhetoric and replaces ‘Grammatical Epistemology’ with ‘Rhetorical Epistemology’, so that he reveals the cosmic order is constructed through rhetoric activity, which appears as truth with no doubt on the surface and destroys itself with its tropes construction in secret.

Key words: Rhetoric, Grammar, Logic, Rhetorical Epistemology

^① Paul de Man, *Allegories of Reading*,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131.